

比较文学基本范畴与经典文献丛书

顾问 杨慧林 主编 高旭东

范方俊 著

影响研究

影响研究

范方俊
著

比较文学基本范畴与经典文献丛书
顾问 杨慧林 主编 高旭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响研究 / 范方俊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4

ISBN 978-7-301-28971-6

I. ①影 … II. ①范 …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3356 号

书 名	影响研究
	YINGXIANG YANJIU
著作责任者	范方俊 著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971-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6820
印刷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商	新华书店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26 印张 322 千字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 录

绪 论 比较文学的百年学科发展变迁及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性质 001

上 编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缘起与理论概述 027

第一章 “影响”的定义及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性质 029

第一节 “影响”一词的本意、流变及其在文学研究上的
衍用 030

第二节 民族文学内部影响研究的国别文学史性质 037

第三节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世界文学性质 052

第二章 比较文学早期发展阶段对于影响研究的关注及说明 069

第一节 法国比较文学早期发展阶段对于影响研究的
关注及说明 070

第二节 德国比较文学早期发展阶段对于影响研究的
认识和论争 079

第三节 英国比较文学早期发展状况及其对影响研究的 认识	088
第四节 其他欧洲国家比较文学早期发展阶段对于影响研究的 关注及说明	097
第三章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形成及其对于影响研究的理论说明	111
第一节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缘起、形成及确立	112
第二节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对于影响研究的对象及方法的 理论说明	131
第三节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对于影响研究之特性的 理论说明	145
第四章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异军突起及其对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 质疑与批评	154
第一节 美国比较文学在早期阶段的发展状况和 其后美国学派的异军突起	155
第二节 美国学派对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质疑与批评	165
第三节 美国学派是否真的完全排斥法国学派的 影响研究？	175
第五章 比较学界对于影响研究的反思、吸纳及新见解	185
第一节 法国学派对于自身的影响研究的反思	186
第二节 美国学派对于影响研究的合理吸纳	193
第三节 比较学界对于影响研究的新见解	202

下 编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诸领域及研究案例 213

第六章 文体与风格 215

- 第一节 文体的类型及比较文学关于文体演化的研究案例 216
第二节 “风格即人”及比较文学对于作家创作风格的案例说明 236

第七章 题材典型与传说 252

- 第一节 题材的定义及比较文学关于题材的研究案例 253
第二节 典型的定义及比较文学关于典型的研究案例 264
第三节 传说的定义及比较文学关于传说的研究案例 271

第八章 思想、情感与文学潮流 279

- 第一节 比较文学对跨国界的思想传播及影响的关注和研究案例 280
第二节 比较文学对跨国界的情感传播及影响的关注和研究案例 290
第三节 比较文学对跨国界的文学潮流的传播及影响的关注和研究案例 297

第九章 源流与誉舆 306

- 第一节 出源的定义及比较文学对于出源的研究案例 307
第二节 誉舆的定义及比较文学对于誉舆的研究案例 318

第十章 媒介 335

第一节 作为跨国界文学影响传播媒介的个人及比较文学的
相关研究案例 336

第二节 作为跨国界文学影响传播媒介的翻译及比较文学的
相关研究案例 347

第十一章 接受 359

第一节 接受美学关于文学接受的新见解及其在比较文学界的
理论回应 360

第二节 接受美学关于比较文学的接受研究的新示例 373

结语 影响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渊源及当代命运 386

参考书目 404

绪 论

比较文学的百年学科发展变迁 及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性质

比较文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文学研究领域内衍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过去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比较文学由初期的国别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逐渐扩张成为跨国家、民族、语言、学科和文化的文学研究总称，其扩张速度之迅猛，涉及研究领域之广泛，使比较文学一跃成为世人瞩目的一门“显学”。但与此同时，在比较文学不断“跨越”文学研究的各种边界高歌猛进的过程中，有关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呼声一直相伴始终，比较文学也在回应或克服“危机”的过程中出现了两次重要的“转向”。这样，“跨越”→“危机”→“转向”构成了比较文学百年学科发展变迁的主线。然而，比较文学所涉及的内容虽然庞杂，且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研究重心或方向上的持续转向，

但从比较文学的整体发展和学科定性上而言，无论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由法国学派所主导的影响研究，还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崛起的由美国学派所主导的平行研究，以及后来由中国学者所主导的阐发研究，此外还包括比较文学内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比较诗学，以及在当代仍然方兴未艾的比较文化研究，都是具有明显的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性质。

一、“跨越”：比较文学对于国别、民族、语言、文化等文学传统边界的突破

什么是比较文学？对于任何一门新兴的学科而言，如何以定义的方式对其“正名”都是一个最基本的、约定俗成的工作。然而，对于比较文学而言，恰恰是对这个最基本的、最简单的“什么是比较文学”的问题，比较文学界却一直莫衷一是、争论不断：有关比较文学的“定义”、“性质”的说法或论述不在少数，但各种观点和意见混杂其中，始终难有一个权威的、令人信服的结论。相较而言，中国学者陈惇、孙景尧和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中对于比较文学应“看作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的认识，^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比较文学同行的认可，因为其揭示了比较文学的一个显著的性质，这就是“跨越”。

首先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对于传统文学研究的国别、语言、民族界限的“跨越”。关于比较文学对于传统文学研究的国别、语言、民族界限的“跨越”性质，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奠基人梵·第根（von Tieghem）在其代表作《比较文学论》（*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31）中指出，文学研究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追寻作家本人

^① 参阅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 页。

的生涯以及作家作品的源流及影响。在对传统文学史的源流、影响的考源中，梵·第根不仅从时间和地域方面指出了文学史上的源流、影响的多样性：本国的、古代的、外国的、近代的，而且还从显示影响研究的力度和划分文学研究归属两个方面强调了对于外国文学影响研究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即从显示影响研究的力度而言，相较于局限于本国之内的文学影响，超出本国界限之外的文学影响，无疑更有力度、也更为重要，因为“在同一种族同一语言的作家们之间，模仿是并不是很丰富的。这种模仿或者只是一种一般的影响，……它或者一点不能摆脱窠臼，而一无独特见长之处。……（而）如果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它和别国文学的接触，那时我们便会立刻见到这些接触的频繁以及重要了”；^①从划分文学研究归属而言，通常的文学史研究都是局限于一国文学之内，而牵涉到一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接触，问题就会变得“格外复杂”。因为一国的文学史只需掌握一国的文学即可，出现了外国文学影响则意味着除了本国文学之外还需掌握与本国文学发生接触的外国文学，而外国文学不仅内容繁多，而且还有语言上的困难，往往超出了国别文学史研究的能力和范围。总之，在梵·第根看来，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是一种封闭于国别、民族和语言界限之内的文学研究，在应对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联时有着明显的缺陷，解决此一问题的最明智的办法便是“分工从事”，把超出本国文学之外的外国影响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种专门探讨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相互关系的文学研究，这就是比较文学。很显然，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确立比较文学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的关键，正是其对于传统文学研究的国别、语言、民族界限的“跨越”。

^①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7—8 页。

其次是二十世纪中叶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对于法国学派“事实关联”的“跨越”。按照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对于比较文学的性质和范围的表述，当一国文学的影响超出本国的界限显示出外国因素，也即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之间发生了实质性接触时，比较文学就身当其时、应运而生了，这表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所说的比较文学对于传统文学研究的国别、语言、民族界限的“跨越”本身，并不是任意而为的，而是有明确界定的，这就是法国学派一直所强调的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之间确实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关联”。应该说，法国学派对于两国文学之间相互接触、彼此渗透的“事实关联”的强调，不仅明确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对国与国之间的文学关系的考察，而且用确定无疑的文学事实打消了人们对于比较文学可比性“任意”、“杂乱无章”的质疑，既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早期比较文学学科的确立意义重大，也对比较文学随后的半个世纪的发展影响深远。然而，随着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崛起，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对引领比较文学发展的法国学派发起了猛烈抨击，批评的焦点直指法国学派不准比较文学越雷池半步的“事实关联”。其中，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雷内·韦勒克（Rene Wellek）就在《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59）一文中，抨击法国学派所主张的“事实关联”，其实质是把十九世纪陈旧的唯事实主义强加于比较文学之上，把“比较文学”缩小成为研究文学的“外贸”关系。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亨利·雷马克（Henry Remak）在其论文《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1961）中同样对法国学派一味拘泥于“事实关联”表示不满，并给出了美国学派不再像法国学派那样以是否有“事实关联”为前提来界定比较文学的定义：“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

学与其他知识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①在比较文学的美国学派看来，“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注的是对文学作品的艺术理解和美学评价，不是一些死板的事实；而要增进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评价，需要有一系列的文学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由于文学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不是可以凭空产生的，必须借助对于尽可能多的文学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和区别，所以，美国学派所主张的不是专门针对某一部、某一组或某一国文学作品的文学研究，而是涵盖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传统的“整一性”的文学研究。正因此，美国学派在猛烈抨击法国学派的同时，仍然肯定了其在促进比较文学“跨越”国别、语言和民族方面的历史性贡献。只不过在美国学派的眼里，法国学派的“事实关联”让比较文学对于国别、语言和民族的“跨越”大打折扣，而美国学派对于法国学派“事实关联”的摒弃，就是要打破法国学派给予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人为限制，实现比较文学对于国别、语言和民族边界的真正“跨越”。

再次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比较文学中国学派^②对于欧美文化圈的“跨越”。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美国学派倡导的不拘泥于“事实关联”的平行比较研究在比较文学界风头甚劲，受其影响，寻求“跨越”不同国家、民族、语言和文学传统之上的共同的美学规律，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范围内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且，

^① 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张隆溪译，见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② 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比较学界是有较大争议的，本文提及“中国学派”这一称谓并不表示本人认可或反对它的比较文学主张，只是客观陈述在比较学界有“中国学派”这一称谓的提出。

在探寻不同文学传统的共同规律的过程中，中国的比较学者还在反思美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特色的同时，开始尝试着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台湾学者古添洪和陈慧桦在 1976 年主编《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系列丛书的《序言》中所说：“什么是比较文学呢？简言之，就是超越国家疆域的文学比较研究。就其研究重心的不同，有所谓法国派和美国派之别。……在晚近中西间的文学比较中，又显示出一种新的研究途径。我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或近代文学时，即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由于这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既涉及西方文学，而其援用亦往往加以调整，即对原理论与方法作一考验、作一修正，故此种文学研究亦目之为比较文学。我们不妨大胆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① 在这里，尽管“中国派”的提法的确有些“大胆”且在比较学界备受争议，但“中国”一词的出现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绝对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在此之前比较文学的发展，尽管有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争，但它们都同属于一个“同质”的欧美文化圈，相互之间在文化类型或模式上并没有质的差异；但是随着中国比较学者把“异质”的中国文化引入原先以欧美文化圈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时，就势必会出现如美籍华裔比较学者叶维廉所说的中西“文化模子”的冲突。所以，尽管中国的比较学者最初把比较

^① 古添洪、陈慧桦：《〈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序》，见黄维樑、曹顺庆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台港学者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8—179 页。

文学的研究从西方学者主导的欧美文化圈扩展至中国文化时遭受了西方学者的激烈批评，但就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潮来看，随着二次大战结束后西方中心主义的瓦解和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多元文化的兴起，比较文学打破欧美文化圈的束缚实现世界多元文化的拓展，无疑代表着比较文学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中国比较学者对于欧美文化圈的“跨越”，则是比较文学向全球多元文化拓展迈出的关键的、实质的一步。

最后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比较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跨越”。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世界范围内冷战格局的出现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出现了由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并在以后的数十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文化研究的热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对于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解读和比较，成为当代社会无法回避、必须直面应对的焦点话题。对于比较文学而言，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现了明显的由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转向，其重要标志有二：其一，1992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伯恩海姆（Charles Bernheimer）主持一个十人委员会，专门讨论比较文学的现状，并于1993年完成了一个名为《跨世纪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的报告，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两个发展趋势：一个是比较文学由欧美向全世界扩展；另一个是比较文学转向比较文化。其中，前一个趋势已被后来的比较文学的发展所证实，而后一个趋势则引发了比较学界关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之间关系的激烈论争；其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对于比较文化的不遗余力的提倡。1994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4界大会的主题是“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明确强调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作用，而其下设的六个分题：文化的民族个性、外国与本土的相互影响、文学类型语言和文化、文学与其他

文化表现形式、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多元化研究的方式与方法，比较文化所占的比重也明显地超过了比较文学。事实上，1994年之前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历届大会议题，尽管有文化内容的出现，但其核心确定无疑的是文学研究。然而，反观1994年以后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多届大会议题，诸如“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1997年第15界年会），“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传递与超越”（2000年第16界年会），“‘在边缘处’：文学与文化的空白、前言及开端”（2004年第17界年会），“超越对立：比较文学的间断与位移”（2007年第18界年会），“拓展比较文学的疆界”（2010年第19界年会）等等，比较文学已经基本上被比较文化所“淹没”，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边界也被比较文化无情地“跨越”。

二、“危机”：比较文学学科定位的合法性问题

与比较文学的“跨越”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它的“危机”。“危机”一词，对于比较文学而言，其出现频率之繁，持续时间之长，的确算得上是这门学科发展上的“奇观”。不仅比较文学要面对外界对其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性的质疑，而且比较文学内部也频现“危机”的声音。

关于比较文学的“外部”危机，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归纳了两类对于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原则性”的反对意见：一类是对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有效性”的否认；另一类是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科学性”的否认。美国比较文学学者乌尔利希·维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也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1973）一书的“历史附录”部分，记录了比较文学发展之初各国学者特别是一些知名学者对于比较文学的反对意见。然而，说到比较文学的“外部”批评，名气最大、对于比较文学学科产生巨大

冲击和影响的人物，毫无疑问的是意大利的大学者、大批评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克罗齐对于比较文学的攻击，主要集中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两个方面。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克罗齐反对比较文学把“比较的方法”用作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石，因为“比较”不仅是一个普遍的、常用的方法，而且是一切文学研究共有的工具，并不为比较文学所专有。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克罗齐对比较文学的主要领域如主题学、题材史、文类学以及文学的和历史的影响研究持“全盘否定态度”。应该说，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确立而言，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克罗齐从方法和对象两个方面对于比较文学的质疑和反对，是触及到比较文学的学科根本的，不仅在外部形成了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定位的外在压力，而且从内部引发了比较文学学者直面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内在勇气，而比较文学内部后来频繁响起的“危机”声，可以视作是对克罗齐危言比较文学的回声和反响。

比较文学“内部”的危机，就是比较文学的内部人士对于其学科定位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最直观地体现于比较文学内部权威学者直接冠以“危机”之名的各篇论文中。在比较文学危机论的相关学者中，美国的雷内·韦勒克是为人所熟知的一位。维斯坦因曾经以医生和病人为喻，用半开玩笑的口吻描述了韦勒克和病入危机的比较文学之间的关系：“在‘比较文学及有关疾病医院’的‘美国分院’中，韦勒克担任（也许被迫担任——‘半拉半就’）主治大夫和定期公报的签署者。他描述病人的状况，有时也冒险做出诊断。”^①而韦勒克对于比

^① 乌尔利希·维斯坦因：《我们：从何来，是什么，去何方——比较文学的永久危机》，韩冀宁译，见孙景尧选编：《新概念 新方法 新探索——当代西方比较文学论文选》，桂林：漓江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 页。

较文学所作的危机诊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从时间上讲，克罗齐对于比较文学的发难是二十世纪初，距离韦勒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这次的“危机”言论，中间有将近六十年之久的间隔。在这期间，确切地说，在克罗齐从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两个方面提出对于比较文学的反对和质疑之后，如何从上述两个方面回应克罗齐的责难，实现比较文学学科的科学定位，一直是后来的比较学者特别是以巴登斯贝格（Femand Baldensperger）、梵·第根、伽列（Jean-Marie Carré）和基亚（Marius-Francois Guyard）等人为代表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孜孜以求的目标。尽管在法国学派看来，他们已经完满地解决了比较文学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但在韦勒克的眼里，法国学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说明并不令人满意。比如，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主题，韦勒克认为法国学派区分比较文学拥有“特别的主题材料”的企图是失败的，至于法国学派建基于“事实联系”之上的探寻来源—影响的“特别的研究方法”，韦勒克更是直言其是“更为明显”的失败。韦勒克肯定地表示，比较文学“至今还不能明确定研究主题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就足以说明比较文学学科所处的危机状态，法国学派对于比较文学所提出的纲领性意见“还没有解决这个基本课题”。^① 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发表后，在比较文学内部引起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激烈论争。作为回应，法国学者艾田伯（Etiemble）发表了《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Comparaison isn't the Reason: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63）一文，副标题直接使用了韦勒克的原标题。这场发生于二十世纪中后叶比较文学内部的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定位的论争，也被人们通常冠称为比较文

^① 雷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沈于译，见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2 页。